

武玉笑剧作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1234.7/92

DFS1/15

武玉笑剧作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4099



944099

责任编辑：王曼生
封面设计：娄溥义

武玉笑剧作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8 印张17.75 字数333,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书号：10096·304 定价：1.45元

序

(一)

十几年以前，当武玉笑同志的话剧《远方青年》在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兰州等地上演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畜牧兽医工作者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听着马蹄声、马嘶声，就象重新回到了牧群；看到阿米娜、玛依拉……，也就回忆起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的往事。”
“看了戏，使我重新想起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也认真检查了今天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我应该向沙特克学习，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终身做一个畜牧兽医工作者。”

（见1964年4月《甘肃日报》）

人们常说文艺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文艺研究评论工作者也曾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来论述文艺的社会作用。回忆一下《远方青年》演出时在观众中引起的这些反响和激动，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并非没有争议的问题，是会有帮助的。

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文艺是能够影响人、陶冶人，能够给人以启发、教育和鼓舞的。希望用自己的作品为人民服务，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从而

树立起崇高的生活目标和生活信念，曾是许多作家呕心沥血、终生追求的最高奖赏。对作家来说，有什么能比读者的信任更使他感到欣慰和满足呢？

但文艺要影响人，要对生活起积极的推进作用，不能指靠文艺以外的手段，而只能依靠文艺自身的思想力量，艺术力量和道德审美力量。作品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作品的形象体系中是不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贯注着作家的思想和激情？透过那复杂的、多彩的，或是朴素的、明朗的生活画面与生活场景，作品从美学上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感受和体验？……所有这些，往往使许多优秀的作品越过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进入我们的感情世界，“扰乱”我们的平静，使我们激动不已。

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我在初看《远方青年》时的激动和喜悦。

那是一九六四年的春天，兰州的夜晚还很有一些凉意。但当我置身剧场随着帷幕拉开进入剧情时，心里却感到十分火热。那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正是沙特克、阿米娜们的同龄人。尽管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从事的职业与我相去遥远，但他们的命运、遭遇、思想、性格，却是那般触动我的情怀；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矛盾、思考的问题和走过的道路，仿佛也就摆在我的面前。因此，几乎我就忘记了是在看戏，而是觉得好象进入了生活本身，不由得同剧中人一起经历了一段紧张的欢乐、苦恼和思索。

看完戏回到家里以后，思绪仍在不停地翻滚，沙特克、

阿米娜们的形象依旧在眼前萦回。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年轻人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青春放出光华？友谊、事业、理想、爱情，这些崇高优美的词汇里究竟包孕着一些什么样的含义？这些激动人心的生活哲理和人生要义，随同剧中人物的形象一起向我袭来，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为什么一次演出能有这样的吸引力量呢？甘肃省话剧团纯熟而精湛的表演艺术固然很有魅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剧作本身有一种力量。后来当我谈到剧本的时候，我发觉通过文字语言，也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也能同剧中人物进行思想和感情的交流。这便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优秀的剧本也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武玉笑同志的其他几个剧本，如《天山脚下》、《大雁北去》、《爱在心灵深处》，我没有得到从舞台上去欣赏它们的机会，便都是通过阅读同它们相识的。

现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准备把这些剧本结集出版。对于不曾欣赏过舞台演出而又爱好戏剧和文学的广大读者来说，对于从事话剧或戏剧工作的同行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热心的读者，又一次读了这些剧本以后，也想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体会。

(二)

武玉笑同志走上戏剧创作道路以后，不知是生活有缘，还是作者有心，一开始就与少数民族的生活发生了亲密的关

系。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所写的作品中，除了《大雁北去》以外，全部都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这种现象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应该说，这是作家一种自觉的努力。

大家知道，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直到解放前夕，大多数兄弟民族，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兄弟民族，仍然处在比较落后的历史阶段。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各兄弟民族历史上新的一页；党的民族政策，更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成一个平等友爱的大家庭。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各兄弟民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努力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和斗争，用艺术形象再现他们在新时代的精神风貌，便成了发展祖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作家所面临的一项光荣任务。在这方面，武玉笑同志是比较勤奋的一个作家，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作家。因此，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人曾称他是“兄弟民族新生活的歌手”。

我们读他的作品，或是看他作品的舞台演出，确实能够领略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多彩多姿的生活风貌，感受到浓郁的时代气息和诗的抒情意境。但是，如果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新生活的歌手”，看作是新社会少数民族幸福生活的讴歌者，那就远远不够了，而且也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创作实际。

是的，就题材和内容说，他写的都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就风格和手法讲，他作品中常常洋溢着一种清新悠扬爽朗乐观的牧歌情调和边疆地区特有的生活韵

味。无边的草原，盛开的鲜花，奇异的雪峰，突兀的山泉，绚丽多彩优美动人的诗一般的语言，真挚热情豪爽质朴的民族性格，确实令人如醉如痴，无限神往。但是，武玉笑同志并不是那种浮光掠影的观光者，更不是搜新猎奇的旅游家，他的作品所给予我们东西也远远不止是上面这一些。他是一个严肃思考的人，创作里浸润着一种深深的责任感。所以，与同时期有些作品不同，他并不一般地满足于通过今昔对比去歌颂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喜悦，或是借助于离奇曲折的情节和奇谲虚幻的传奇故事来眩人眼目。他向自己提出了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着力开掘新生活在少数民族人民精神世界上所带来的变化，描写他们在党的指引下创建新生活的斗争历程，绘出社会主义时期边疆地区的历史画卷。由于这样，就使他的创作脱开了一般“歌颂新生活、鞭笞旧社会”的普通格局，而有了较深的历史感和比较独特的生活内容。

象《天山脚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描写维吾尔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合作化道路的作品。如果仅仅着眼于今昔对比，翻身解放，作家很可能就要被那种表面的风和日丽的景象所迷惑，看不到生活本身所蕴藏的矛盾；或者只能捕捉到一些由社会学理论所提供的关于矛盾概念的生活实例，而捕捉不到流动的、⁹生活内在的辩证法。令人欣喜的是，这部反映合作化题材的戏剧作品，尽管还有不少粗疏不足之处，艺术上也还缺乏足够的提炼和剪裁，人物性格的刻划甚至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哈力克这个人物的性格就显得不够统一），

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显然不是那种浅薄的、让人一览无余的作品。由于作者贯注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有着自己对生活的发现，因此，通过这部作品，作者不止是让我们看到了天山脚下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过程，更主要的是写出了人的变化，精神的成长，家庭社会和伦理道德新原则的胜利。

作家没有回避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他把合作社巩固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难，如暗藏敌人的破坏，富农分子的捣乱，落后群众的动摇，特别是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都真实地揭示出来。但他着重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矛盾的解决过程，而是人们在精神世界所展开的斗争。阿衣夏姆在最后面对离弃自己、而又归来的丈夫激动难过地说：

我不明白，不明白……旧日子，给我们的是什么？艰难，
困难困苦，（稍停）新日子，上改，给我们的是幸福。可是，
旧日子给我们留下的旧想法，又来破坏它，日子是永远也不
会原谅这个的。

“旧日子给我们留下的旧想法”，来破坏我们新建立起来的新生活，这就是作家对生活的发现。正是这种发现，使《天山脚下》不同于一般写合作化题材的作品，而有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它把广阔的社会内容熔铸到人们同旧观念作斗争的三棱镜上，通过合作化带头人阿衣夏姆的家庭纠葛和维吾尔族妇女冲破世俗偏见在社会上站立起来的斗争历程，热情地讴歌了社会主义道路给人们思想深处所带来的可喜变

化，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辩证法。这种着重于从人的精神历程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作法，是武玉笑同志戏剧创作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武玉笑同志自觉追求的艺术目标。我们之所以既称他是兄弟民族新生活的歌手，也称他是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者，原因也在这里。

(三)

文学就是人学。戏剧作品反映少数民族的斗争生活，当然应当传达出边疆地区特有的风光特色，把读者引入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茫茫草原，雄浑大地，使人们领略到祖国的伟大，生活的宽广。但是，更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塑造人物。只有写出真实生动、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典型特征的各色各样的人物来，作品才能更深刻地反映现实，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并推动生活前进。

武玉笑同志是一个十分重视人物塑造的剧作家。他所塑造的许多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如《天山脚下》的阿衣夏姆、阿一甫，《远方青年》的沙特克、阿米娜、艾利和卡生拜克，《大雁北去》的高兰英，《爱在心灵深处》的莫合塔尔、阿赫卖江等等，已深印在读者和观众的头脑里，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这些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一如生活本身那般真实朴素，亲切感人。它们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又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美感力量。这些人物，是从生活中来的而不是

从理念中来的。作家严格遵循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让人物按照他们本来的面目走到我们面前，通过他们自身的行动，显露他们的本质。在他的笔下，即使是次要人物或陪衬人物，也不是单为交待情节的工具或是充当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都具有自己的性格和个性特征。作家爱他所肯定的人物，但他并不随意给这些人物涂上金粉、戴上灵光圈，让他们通体发亮，变成超凡入圣的“英雄”；作家憎恶那些阻碍生活前进的恶势力，鄙视渺小的个人主义者和玩弄阴谋的小人，但他也不故意把这些人物涂成小白脸，进行漫画化，而是严格从生活真实出发，提炼有典型特征的生活细节，如实写来，便真伪毕露。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武玉笑同志对正面形象的探索。

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充分发掘革命人民的精神美和道德美，用正面人物形象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来教育人和鼓舞人，应该是社会主义文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在武玉笑同志为我们所提供的人物形象群中，有不少人是堪称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家从这些人物身上发掘了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寄托着崇高的革命理想。

比如，《远方青年》的沙特克，这是一个塑造得十分成功，曾经在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艺术形象。作家满怀革命的激情，通过沙特克形象的创造，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生
活意义，歌颂了真正革命者的青春，对我们有着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沙特克只是一个普通的畜牧兽医工作者，论学

识不过是中专毕业，论地位顶多是个技术员。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从事着极其平凡的工作，给马治病、防疫、打针。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活价值吗？这样一些琐碎细小的防疫工作，能够使他大有作为吗？对某些只以地位、职业和个人利益作为价值标准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沙特克是一个善于发现自己、有着坚强的精神力量的人。他从平凡的劳动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从琐碎细小的工作中获得了创造的欢乐和诗情。他诚实地、顽强而英勇地劳动着，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有人看不起这种“不起眼”的劳动，当艾利咄咄逼人地宣称自己“是人”，忍受不了这种“山里人”的“野外生活”时，沙特克曾自豪地回答：“野外有野外的乐趣，乘上骏马唱起歌，心胸多开阔。家家毡房里都有马奶子，新鲜酥油喷鼻香。……”这种生活创造者的襟怀，多么让人崇敬和向往！这种对生活美的特殊的感受，是那些生活的旁观者能够领略得到的吗？

《远方青年》的卡生拜克，也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创造。作者从这个“普通养马人”的精神世界里，发掘了一种十分令人宝贵的品质，这就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工作和劳动怀着主人翁的热忱。他那豪爽而倔强的性格，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质朴和刚强；他那“对好事满面阳光，对坏事满脸冰霜”的鲜明爱憎，更贯注着一种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有人曾经认为，这个人物“对人的抱怨情绪有点过甚，显得不近情理”。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表面看来，这个“旧社会没有穿过一双靴子的牧羊人”，对人的确是有些过于严

峻了。难产的顿河马驹差点被断送，他气愤得要到场部去上告阿米娜；顿河种马被“治倒在马厩里”，他痛苦得面色阴沉。这里，岂止是严峻，简直近于执拗了。但这种执拗，正好显示了他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表明了他主人翁的生活态度。当年轻人能够把自己的青春投入集体事业中，成为集体所需要的人时，卡生拜克对待他们是非常富有人情味的。暴风雪夜他冒险去救沙特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是一个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生活意义的人。请听听他那段与其说是抱怨别人，不如说是严肃自责的沉痛的道白：

“想想吧，……想想我这个旧社会没有穿过一双靴子的牧羊人。老了老了，共产党给了我生活的力量，给了我光荣的信任，我给国家养上了高骡子大马！五九年我又从草原到了遥远的北京！见到了我们福星、恩人毛主席！天哪，我双手握住他那只又厚又大又热的手，我的心象冰山融化了，眼眶发热，涌出了幸福的泪水，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一辈子钻在山里放牛放马的老哈萨克竟成了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可是真主没有眼睛偏偏在我当了养马英雄的第二年春天，马驹，马驹流产到夏特。种马，种马倒在我的马厩。象毒蛇咬着我的心！”多么真挚的感情，多么淳朴而又宽广的胸怀。通过这段沉痛的道白，我们简直触摸到了哈萨克老人那颗火热跳动如金子一般美好的心灵。

注视人的精神道德的成长，关心人的生活和命运，赞美劳动和斗争，把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作为自己艺术思维的中心和哲学探索的命题，这就是武玉笑同志一贯坚持的创作态

度。他曾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阿一甫说过这样两句话：“人活着就是一门大学问啊！”“天地间，有多少叫人难解的秘密啊！”可以也应该把这两句话看作是武玉笑创作探索的主题：一、研究“人活着这门大学问”；二、探索天地间最难解的生活的秘密。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生活的秘密在哪里？

高尔基写道：“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他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只会吃喝，只知道很愚蠢地、半机械地生孩子的动物”。（《文学论文选》第71页）但是，旧的社会枷锁和思想枷锁，却扼杀人的天性，摧毁人的尊严，贬低普通人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劳动者只是供人驱遣的奴隶，劳动人民不过是“伟人们”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他们不相信人有巨大的创造智慧和潜能。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党的事业和斗争，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发现人，解放人，恢复人的尊严，恢复人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把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提升到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人的高度。为党的思想所武装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它的崇高使命也应该从艺术上来肯定人的价值，发掘人的精神和道德的美，用“真正的人”的光辉形象来鼓舞人们和教育人们，为人们指出通往新的生活的道路。武玉笑同志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同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探索劳动人民的心灵美和精神美，这个艺术方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的劳动也是取得了积极效果的。

(四)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要求作家必须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虚假的作品，不管装扮得如何精巧，也是不配称为文学的。武玉笑同志的话剧创作，是敢于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他从不回避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十年浩劫的磨难，锻炼了他的思维和观察能力，他对现实的思考更加严峻和深沉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写的话剧《大雁北去》和《爱在心灵深处》，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严肃思考的产物，也是作家在话剧创作上新的探索。

呈现在这两部作品里的基本内容，是我国人民在那段动乱岁月里的痛苦生活。现代迷信汹涌泛滥，历史沉渣搅动翻扰，“人们一切美好纯洁的心灵和道义”，被“践踏得血肉模糊，一片粉碎。”正义遭贬斥，邪恶逞凶狂，人伦颠倒，道德沦丧。理想、信念、热情，诚实、正直、善良，受到粗暴的凌辱和攻击；人与人的同志关系被蒙上冷酷和忌恨的阴云。穿着现代服装的中世纪的、亚细亚式的野蛮专制，打着革命招牌的公开的欺骗和阴谋，出尔反尔，翻云覆雨，叛卖变节，落井下石……所有这一切人世间的丑恶和秽行，作者都没有回避，没有退让，他勇敢地正视，真实地描写，不避“暴露”和“伤痕”之嫌。两部作品都采用了悲剧的结构和悲剧的体裁，不能认为是作家的心血来潮，以意为之；而应该看作是生活的提示和启发，是作家忠于生活、忠于现实的

表现。

但如果把《大雁北去》和《爱在心灵深处》只看作是展览伤痕、暴露黑暗的大悲剧，把武玉笑同志的新探索看作是他过去创作道路的大转折，那就有失偏颇，太不公正了。不，武玉笑同志仍旧是一如既往的生活美和心灵美的探索者，是对生活充满乐观激情的剧作家。只是，他对生活的思考随着我们整个文学的成长而更趋成熟了；他对美的探索采取了新的途径和方式。

这种新的探索，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特色。

特色之一，就是作品的现实主义更加深化。无论是《天山脚下》，无论是《远方青年》，它们的艺术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它们产生在那样一个极左思潮已经露头、虚假浪漫主义正喧闹热火的年月仍能保持对现实比较清醒的态度，也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比起《大雁北去》和《爱》剧来，它们在对现实的开掘深度上，依旧是有所不同的。诚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天山脚下》不同于一般写合作化题材的作品，它很少受到流行公式和概念的束缚，本质上是从生活出发的好作品。但是，“暗藏敌人破坏、富农分子捣乱、富裕中农动摇”的模式也还是在它的身上投下了一道微弱的阴影。《远方青年》是别具特色的隽永诗篇，艺术上十分精炼和完整，这一点，也许是后两个剧本也尚未超越的。但是，它在思想探索的深度上，它对正面形象精神力量的考验，有时过多地借助于外界自然的压力，而缺少更加紧张的内在冲突，不能不影响到它的更加强烈的现实主义力量。

比起《天山脚下》来，《大雁北去》所揭示的现实矛盾就要尖锐深刻得多，高兰英所面临的精神考验也要比阿衣夏姆复杂艰巨得多。按照个人出身和生活时代讲，高兰英属于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是富于革命理想和热情的医务工作者。她对事业充满责任感，对生活充满信心。但是，以革命名义卷起的一场社会风暴，把她所信守的革命原则击碎了，轰毁了。政治上的高压，生活上的波折，感情上的痛苦，爱情上的不幸，有如拔地而起的飓风，扑面向她袭来，她“象一只被暴风雨打落了的孤雁，到处颠簸”。她要忠实于自己的丈夫，立刻受到“丢掉党籍”的威胁；她要坚守医生的职责，又被攻击为没有同情心，“道德在沉睡”；她热爱党的老干部，又变成了“铁杆保皇派”；当她在患难中同沈默然相识、出于共同的生活态度而产生了真挚爱情的时候，偏偏前夫赵子明又出现在面前。这更成了她受到攻击和诬蔑的借口。总之，灾难和不幸，歧视、排挤和熬煎一个接踵而至，她能够承受得了吗？作者通过对现实的无情解剖和真实反映，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时代和社会原因。

但《大雁北去》并不同于某些展览伤痕和眼泪的“凄凄惨惨戚戚”的感伤消沉之作，无边的苦难和不幸也没有吞噬高兰英对生活、对事业、对理想的信念。她象逆风而行的大雁，穿过暴风和严寒，尽管受到巨大的创伤，但并没有被风暴和严寒吞没。严峻的现实生活图画中燃烧着理想的霞光，巨大的悲剧冲突中震荡着乐观的激情，这便是《大雁北去》